

39.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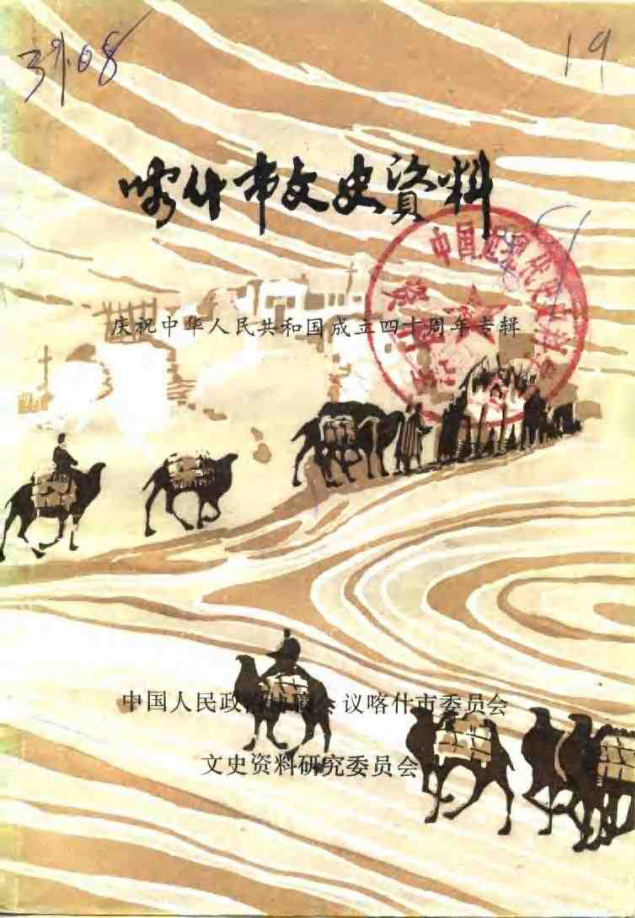
19

喀什市文史资料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喀什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喀什市文史资料

第四辑

1984.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喀什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内部发行

喀什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版

喀什日报印刷厂印刷

32开本 字数105000

印数0001——1000 工本费：2.43

一九八九年八月印刷

主 任：苏荣春

责任编辑：王时样

编 辑：夏维荣

封面设计：王世林

校 对：王时样 夏维荣

各族人民发动革命
传统携手共进，为
振兴喀什市而奋斗！

苗世旺
一九九零年
五月九日

中共喀什市委书记苗世旺同志题辞



①浪迹天涯四十载



②鱼水情长



③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钟鸿楷 作

目 录

新疆：祖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史 文（1）

回忆录

喀什建市始末……………王应林（17）

挺进西北见闻录……………何志诚（22）

革命熔炉铸新人……………宋亚民（41）

化沙漠为绿洲……………马泽先（52）

国门卫士篇

高原巡逻兵……………锦 江（55）

苏洪卡驻防琐忆……………陈积久（60）

战斗英雄司马义·买买提……………蓝 天（66）

经济建设篇

喀什市市政建设发展概况……………王应林（70）

南疆现代工业的先声……………古占纬（82）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喀什市工商业·····	韦永生 (88)
喀什的传统民族手工业·····	艾克拜尔 (94)
我与喀什外贸工作·····	张静宇 (103)

历史资料篇

清末喀什噶尔对俄边境贸易·····	龚一匡 (115)
辛亥革命时期的喀什哥老会·····	王时样 (137)
喀什噶尔提督杨缵绪·····	马树康 (147)
喀什噶尔的回民·····	夏维荣 (153)
瑞典传教士在喀什·····	江 (159)
喀什维吾尔医及其医院·····	张莉 (162)

新疆祖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史 文

源远流长的经济文化联系

人类发展的历史已有数十万年之久，我国黄河流域古先民的产生就是亚洲古代文明的典型代表。在今中亚地区，距今约60万至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已有人类活动的遗迹。从西部的里海沿岸直至东部的费尔干纳谷地，从南部的上库曼斯坦直到斋桑湖与塞米巴拉金斯克之间的额尔齐斯河流域，都发现有旧石器时代的文物遗址。然而，唯独夹在黄河流域与中亚地带之间的今新疆地区，迄今还未发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与遗物，证明旧石器时代的新疆还是个人迹罕至的处女地。但距今六、七千年之久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在新疆则多有发现。细石器、磨制石器和彩陶等，遍布东迄哈密，西至喀什，北自阿尔泰，东达和田的天山南北。与同时期的文化遗址相比较，新石器时代，新疆地区的文化遗址与中亚地带的哲通文化与克尔特米纳尔文化有显著的不同，然而却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而且新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与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东北北部地区等省区同一类遗址在地域上是连成一片的，类型也是一致的，这表明，新疆六七千年前的原始人类不是来自西方，而是来自东方。这些部族主要是生活在今内蒙、甘肃与

青海的塞种(允姓之戎)、诸羌之族与此后陆续西迁的丁零、居延人、单桓人、龙勒人、吐火罗人、焉耆人、大夏人以及乌孙、大月氏、匈奴等部族，他们构成了今新疆的古民族群体。这些早已为史学界与文物考古发现所证实。

古文化特征的一致性与血缘关系的相近，使新疆地区的古人类在经济与文化方面很自然而又自愿地亲近、依附东方的同宗。他们把内地的原始经济带进西域，也把自己西迁后新开发的原始文化输入内地，成为后来世代相传历久不衰的经济文化联系的开端。

以产丝绸著称于世的我国中原，开始将丝织品源源不断地通过西域输向欧罗巴洲之际，今新疆地区的玉石也大量地运进内地，这比张骞“凿空”之时要早十几个世纪。1976年冬，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出土文物就是有力的证明。这是我国商代殷王武丁配偶的墓葬，内中出土以礼器、仪仗、日用具与装饰品为主的玉器多达756件，占出土文物总数的39.2%。色泽鲜亮的玉器在琢玉工艺与抛光技术方面达到了同时代世界的先进水平。经国内外专家鉴定，这些玉器几乎全是新疆的玉料，而且均来自昆仑山下的和田、莎车一带。至于内地传入的丝织品以及漆器、刺绣、金银首饰与铜器等物，在新疆各地出土的不胜枚举，如春秋战国时期的阿尔泰古墓中风鸟纹高级丝织品与阿拉沟、哈密五堡出土的漆器、铜镜等物，都曾轰动一时。

据成书于战国时代的《逸周书·王会解》中记载，周武王伐纣时就曾得到过今新疆地区不少民族的大力支持。灭商后，在周成王召开的庆功大典上，葱岭东西的各小国都来庆贺，其中渠搜（今帕米尔一带）赠会飞且食虎豹的鼯犬，昆

仑部献青玉，莎车则“以橐驼、白玉、野马、驹騊、馱𩊔、良弓为献”。西周穆王（公元前976—922）也曾“使造父御，西巡守，见西王母，乐之忘归”（《史记·赵世家》）同时一直走到新疆南端，“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以观黄帝之宫”（《穆天子传》卷二）。在西巡途中，穆王还给沿途少数民族馈赠金银器饰、绵丝、朱丹等物，还特别赠送了贝饰、贝带等当时名贵工艺品。在新疆罗布泊早期墓葬中，曾发现过先秦时期仅产于东南沿海的贝壳，看来这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古代传说在现实中找到了根据。

在文化交流方面，自传说中的远古时代起，新疆与内地的联系也是有史可稽的。史载，黄帝时代，大臣伶伦为定乐律，亲到昆仑山下的“解溪之谷”采风，当地居民送给他1根9寸长的解谷竹音管，可发出“六律六吕”之音。伶伦携管欣然而归，为中原制定了音律。殷商时期，新疆和祖国西南的许多少数民族经常到商都朝贺，“献其乐舞”。周穆王西游时，也有“觴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以王谣，王和之”（《列子·穆王篇》）与“天子南祭白鹿于渚国，大奏广乐”（《拾遗记》）等记载。同时，周朝制定的“六代舞”，特别是王宫中的“四裔乐”，就是当时祖国东西乐舞互相融合的证明。可以说，至少在公元前10世纪前后，新疆乐舞就已传入中原地区。所以，在敦煌莫高窟423窟的壁画上，就出现了西王母与周穆王在一起的图象。

如果说，远古时期新疆与内地的这些联系，还处于自发的、尚未成型的时期，那么，秦汉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日益确立和巩固之后，这些联系就变得自觉与固定化了。公元前

二世纪，西汉博望侯张骞通西域，为这种联系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开创了新疆和内地紧密联系、友好交往的新纪元。我国的“汉唐盛世”，不仅是内地汉民族的强盛时代，而且是边疆各少数民族与内地汉民族共同繁荣富强的伟大纪录！

西汉时代，从内地到西域，“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到了东汉时期，则更是“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后汉书·西域传》），以至出现“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贡奉不绝”（《后汉书·班超传》）的空前盛况。之后的三国与魏晋南北朝，在中原割据时期，这种联系也未曾中断。据《周书》记载，当时有一支西域“商胡240人，驼骡600头，杂彩丝绢以万计”，为了避免河西地区的战乱，绕道吐谷浑地区（在今青海境内）返回新疆，就是一例。隋朝曾专设有西戎使者“掌其方国及互市事”，大力推进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往。唐代之后，丝绸之路成为国际商业的热线，已为众所熟知。

我国宋代，今新疆境内的高昌回鹘政权与喀拉汗王朝同样与内地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以喀拉汗王朝为例，仅正史所记，自公元933年至1068年间，就先后16次遣使至华北的辽朝；而与宋王朝的直接联系，从1009年开始至1088年间，共派遣使团达50次之多，有时一年间达数次。喀拉汗王朝著名诗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在其长诗《福乐智慧》中曾说：“大地裹上了绿绒，契丹商人运来了中国商品”，“如果砍倒了中国商队的旗帜，千万种珍宝从哪里来？”。

元代，今新疆的维吾尔族有许多人去内地经商。据《新

元史》载：“有西域商自东还，太祖命亲王诺延各出资遣人随之西行，购土物，众四百余，皆畏兀人”；“回回商人，持玺书，佩虎符，乘驛马，名求珍异”；“商贩巨万，往来于山东、河北”（《蒙鞑备录》）。

据明代正史所记，当时伊犁、哈密、吐鲁番等北、东疆与内地交往甚多，其实天山以南的叶尔羌汗国与内地交往也是极多的。1972年在今喀什市挖备战地道时，就出土过一件相当精致的铜香炉，上面清晰地铸有“大明宣德年制”字样，为笔者所亲眼目睹。

至于清代以后，这种交往就更频繁了。当时的乌鲁木齐、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等地，皆为商业交易的中心。在这些城市中，几乎都有川、陕、江、浙籍的内地商民；而天山南北的维吾尔族商人进内地经商的也大有人在。当时仅肃州（今酒泉）一地，就有许多来自喀什噶尔的商人，他们“专为经商，多有在此娶妻生子者，家室缠绵，因留于此，遂入籍土人之列”（《鄂本笃访契丹记》）。

商业贸易方面的往来，促进了新疆与内地在其他经济与文化方面的交往。秦汉之后，内地引进西北地区的驴骡以发展农耕；而魏晋时代，新疆又汲取了内地先进的犁耕与浇灌等农业技术。内地的高粱、花生、芝麻、茴香以及多种瓜果、蔬菜等作物，也是秦汉之后通过新疆输入的。特别是棉花，东汉末期至唐代在新疆已广为种植，内地到北宋之后才开始普遍引种，时人称之为“白叠”，其实就是突厥语“帕合塔”的译音。其他如酿酒与磨面之法也是汉代自西域传入中原，才使麦子成为北方人民的主要食粮的。古代新疆人民早已开始使用椅凳一类高坐用具，东汉末年传入内地（时称

胡床)，方才逐步改变内地席地而坐的习惯。今罗布泊、尼雅二地所发现的雕着花纹的木椅，就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椅子。汉晋时期内地服饰与饮食用具已传入新疆，在今吐鲁番、罗布泊、尼雅等地出土许多木梳、铜镜、漆奁（盛铜镜之盒）等梳妆用具与木匕、漆匕、木盘、木箸、釜、甑等饮食用具，或是从内地输入，或是内地的仿制品。

在文化方面，新疆地区的各族人民从汉代就开始学习使用汉语汉文，当时西域各小国都设有“译长”官职，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唐代新疆的坎曼尔诗签及卜天寿《论语》抄本以及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与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等，都是很好的证明。而新疆地区佛教文化的名人在内地也有杰出的代表，如龟兹人鸠摩罗什与疏勒人裴惠琳在内地就极有名气。高僧慧琳在长安西明寺所著《一切经音义》100卷，不仅至今堪称文化瑰宝，而且还流传到日本、朝鲜等中南亚地区。至于萨都刺、贯云石等文化名人，在中国内地文坛上的地位与作用就更为显著了。

汉代以后，新疆的乐舞和乐器更是大量涌入内地，仅据《文献通考》的乐考部分记载，由西域传入中原的乐器就有几十种之多，如笛、琵琶、胡琴、羯鼓、腰鼓、筚篥、笙、篪、唢呐等等，而乐舞中龟兹乐、疏勒乐、于阗乐、伊州乐、高昌乐等，更使内地的音乐艺术的发展得益非浅，同时反过来也促进了新疆地区文化艺术的发展进步，使得新疆至今仍以歌舞之乡闻名全世界。

牢不可破的政治隶属关系

或许有人认为，仅有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还不足以证

明领土归属问题。自古以来，除今新疆地区而外，与中原内地保持这方面联系的几乎是整个欧亚大陆。这是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中国对新疆的领土主权的形成，早在二千一百余年前的西汉时代就已成为定论，历史事实丝毫不容怀疑！

我国新疆与内地源远流长的历史交往，在经济上双方交换生产与生活不可或缺的物质产品，在文化上互相交流文化素质较好的精神产品，这是各民族群众的共同需要。所以，边疆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常以保持对中原王朝的隶属关系，作为维持和加强经济文化联系的纽带；而中原王朝的封建统治者，也常把这种不可分割的经济、文化联系，上升为政治隶属关系，对边疆地区实行正常治理，这完全符合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内各民族人民的切身利益与共同要求。

远在西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40—87），我国中央政权对今新疆地区就从此前一般意义上的朝贡和封赐而行使国家行政权力了。当时，赵破奴、姚定汉、李广利、傅介子、常惠等将吏，都曾代表汉朝在西域进行过一系列军事、政治活动，其间还有细君公主、解忧公主与乌孙和亲的动人故事。公元前68年之后，汉朝派遣以郑吉为首的官吏在新疆开展大规模军垦屯田，与新疆各少数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匈奴的侵扰。公元前60年（西汉神爵二年），汉朝以郑吉为首任都护，在今新疆轮台县设西域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和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及帕米尔地区的36个小国，正式宣告今新疆地区归属我国中央政权。据史书记载，当时今新疆地区的各小国，都设有汉朝正式任命的各种名号的王、侯、都尉、将军、骑将、译长等地方官员，接受汉朝的册封与印绶的各同少

数民族首领，就有377人之多。当时这种一个城邦或地区政权称为一个“国”的现象，一直到明代还存在着，正如《明史·西域传》所说：“地大者称国，小者止称地面”，形式上只同于内地王族受封的诸侯国，不能混同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国家”的概念。

王莽执政时期，由于执行了错误的政策，将西域诸国一律降格改称为侯，各国怨愤，纷纷倒向匈奴，致使今新疆地区在政治上与中原一度断绝隶属关系。至东汉初年，莎车王贤勾结匈奴，意欲霸占西域，分裂统一。公元45年，“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国俱遣侍子入侍，献其珍宝。及得见（汉光武帝）皆流涕稽首，愿得都护”（《后汉书·西域传》）。在西域各族人民的强烈要求下，东汉中央政府委派班超等人，终于在西域重新设立都护府，博得了各族人民的一致拥护。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9年），内地虽然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但今新疆地区依然一如既往与中原某些地方政权保持着从属关系。内地的这些地方政权不仅都先后在新疆设西域长史，而且先后封西域诸王为“守魏侍中大都尉”与“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的头衔。即使公元327—422年间频繁更迭的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宋等，也从未中断与西域的联系。北魏统治时期，仅疏勒国从公元435年至512年间，就先后15次向北魏政权遣出使者表示臣属，尽管480年之后，疏勒国还被嚙哒人所役使，也不曾改变疏勒国与西域人民心向中原维护统一之志。隋朝重新统一全国之后，先后在西域地区设伊吾郡、鄯善郡、且末郡，同时又设西域校尉，负责处理西域的军政事务。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高度集中统一的中央王朝，对西域地区的管辖也随之大大加强。公元640年，唐朝在今新疆吐鲁番（后迁往龟兹）设立安西大都护府，统辖天山南路与葱岭以西。648年，唐朝又先后在焉耆、龟兹、疏勒、于阗设置了都督府和州，均以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都督与州刺史。702年，又增设北庭大都护府，统辖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地区。近年来，新疆出土的许多唐代文书都盖有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印文（出土于新疆的北庭大都护印章，清末被沙俄驻新疆领事馆窃去）。在都护府之下，唐朝政府还设有各级行政、军事组织，如军、镇、城、守捉、堡、戍、烽、驿，它们有效地执行唐朝中央政府的军政命令，为表彰当地少数民族捍卫祖国统一的功绩，唐朝中央极力称赞他们“嗣守职官，祇若朝化，率其种落，保我边陲”（《册府元龟·外臣部》）。许多西域少数民族首领都曾受到唐朝封王的嘉奖。

公元840年之后，原生活于我国漠北高原的回鹘部族大规模西迁，先后在今新疆地区建立了高昌回鹘汗国与喀拉汗王朝。此后不久，在中原地区也出现了宋朝与辽朝两个政权。今新疆地区的两个政权都对中原的两个政权表示归附与亲近。如高昌回鹘汗国就曾接受辽朝在吐鲁番盆地建立阿尔斯兰大王府和高昌大王府的建制，还接受了辽朝授予的大王爵位；与此同时，又多次派出入贡使团加强与宋朝的政治联系。公元983年，当宋朝派出以王延德为首的使团完成政治使命返回之际，高昌回鹘汗国派往宋朝的答谢使团多达100余人。喀拉汗王朝与内地的联系更为密切。喀拉汗王朝派去的使团，每次都受到宋朝高规格的接待。在接受喀拉汗朝的